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陈思和◎主编

实用主义之我见 ——杜威在中国

张宝贵◎编
刘放桐◎序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代表作有《哲学的改造》《确定性的追求》《学校与社会》等。作为哲学家，他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类的思想行为在逻辑上可归结为五步：1.困难的发生；2.困难的认识和说明；3.提出假设；4.对假设的研究与解释；5.假设的证实。他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初，经过胡适等人的介绍，传入中国。五四时期，他还到中国进行讲学，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陈思和◎主编

实用主义之我见 ——杜威在中国

张宝贵◎编 刘放桐◎序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用主义之我见：杜威在中国 / 张宝贵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5
(世纪的回响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 - 7 - 81132 - 589 - 8

I. 实… II. 张… III. ①杜威, J. (1859 ~ 1952) —思想评论②杜威, J. (1859 ~ 1952) —影响—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B712. 51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993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网 址	www. juacp. 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腾莺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589 - 8
定 价	29. 00 元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陈思和

《世纪的回响》丛书共编过三辑,每辑十种。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编成。列名主编的是李子云、赵长天和我,但主要是李子云老师策划的。当时出版界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的著述难以正常出版。李老师负责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她想学习巴金先生在30年代主编《文学丛刊》的榜样,编辑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系统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这个想法大约是得到了巴金和王元化(他们都挂名为这个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和会长、副会长等职)等前辈的支持,我记得“世纪的回响”五个字是巴金先生颤抖的题词,而王元化先生还亲自提议并且找人编辑了诗人辛劳的创作集。具体的过程我记不清了,最初李老师与我讨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正准备出国,她要我推荐两个年轻人来帮她做些具体的编辑事务。我就建议她找复旦的郅元宝和华师大的杨扬,那时他们俩还都是副教授,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杨扬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他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出了不少的力。前两辑编得很顺利,由珠海出版社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第一辑为“创作卷”,第二辑为“批评卷”,每辑十种,作者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卷”有许地山、废名、凌叔华、卞之琳、吴组缃、冯至、穆旦、芦焚、丽尼和辛劳;“批评卷”有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李健吾、梁宗岱、朱光潜、李长之和路翎。编者大多是复旦、华师大的青年学者与一些还在读书或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也有个别年纪较大的研究者参与了工作。这两辑的作者名单是怎么定的我不了解,如果我参加了意见的话,也许“批评卷”里会有唐湜、常风两位的文集。我回想一下自己当时的行踪,1995年底到1996年上半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其后有两次去瑞典和台湾,到1998年下半年我又去了韩国首尔大学半年,总之,是不怎么在上海。等我回来可以安心做一些事的时候,那两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

丛书的前两辑有过不少好评,第一辑出版后不久又重印了一次,正面的评价也不少。出版社方面很高兴,有一次总编还特地来上海请了两桌酒席。本来出版社还想把它作为重点图书去参加评奖,但后来发生了一点问题,因为那些作品都是从原著中找来的,作品的语言还保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言习惯,现在看来就有些不规范,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曾经想按照现在流行的规范修改,但李子云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原汁原味地保留当时作家的语言习惯。这样一来,历史原貌是保留下来了,但却因此无法参加全国性评奖,据说按照现在的出版规定来衡量,这套丛

书的“语言错误”超过了万分之三的标准。但是因祸得福,这套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保持了历史原样,这一点,对研究者对读者都是弥足珍贵的。不过这套书在出版过程中也出过一些纰漏,最有意思的是,设计封面的是一位当时颇有名气的年轻人,他在电脑里找作者照片时,竟忘记了吴组缃的名字,只记住了一个发音“缃”,在电脑里找来找去找出一张吕叔湘的照片就放上去了。等到书印出来了才被人发现,于是出版社只好返工,重印封面,大约是赔了一些钱的。这本有吕叔湘头像的错本,我还保存着。

接下来可以说到丛书的第三辑了。前两辑出版的成功,使李老师和出版社都有了信心,于是开始商量编辑第三辑。因为前两辑分别是“创作卷”和“批评卷”,有人建议第三辑可以编一套翻译卷,出版翻译家的作品。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建议李子云老师,是否可以改变一个思路,不编翻译家文集,而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的文集,这样可能更加有意思一些。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了李子云、赵长天两位的赞同。李老师请示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也很支持,还介绍了黑格尔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认为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如果能编成一卷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周围没有人对黑格尔在中国的历史有研究,几经商量后,决定了这样一批选题:《尼采在中国》《易卜生在中国》《弗洛伊德在中国》《托尔斯泰在中国》《泰戈尔在中国》《达尔文在中国》《杜威在中国》《罗素在中国》《克鲁泡特金在中国》《白璧德在中国》。总选题为《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潮卷”。这套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每一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我们所约的每卷编者都是对某个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因此,第三辑的编辑工作还是很顺利,大约一年以后大部分都已经如期交稿了。

这一辑的审阅工作我稍微多负一点责任。一来是丛书的前两辑我基本没有参与,都是李子云、赵长天两位在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心里很歉疚;二来这个选题也是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二十多年前,我刚毕业留校,中文系安排我担任贾植芳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主持的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项目中的子项目:《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这项工作进行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我和其他同事一起收集整理了近二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还编写了六万多字的大事记。这项研究工作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过去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一般都局限在国内的视野,尤其是批判了胡风的新文学移植论以后,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外,很少有人把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里加以考察。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方法兴起,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贾先生开风气之先,着手研究和编辑这一领域的大型资料,是非常有眼光的工作。可惜资料汇编完成后,出版

方面受到了阻碍。我们的构思过于宏大,内容也过于丰富,反倒成为出版的一个经济负担。这过程中换了几家出版社,每家都说是好书,有价值,诚诚恳恳地接受以后,就放在那里没有声息了。几经催问都不得要领,最后等着我们主动取回了事。这套资料汇编一直放到2004年,为了给贾先生庆祝九十大寿的生日,经过大量的删除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印了出来,书名改为《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分上下册,百万字。原稿被删除了一半以上,被删除的部分,除了大事记以外,主要是涉及具体外国思想家或作家对中国的影响的部分。这部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证明了这个选题在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有着大量的市场需要。

我现在要说的是,《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正是在贾先生主编的那本资料汇编还没有出版音信的时候,着手策划编辑的。我协助贾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有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知识和视野。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是在呼应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起飞的,晚清开始,中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枪炮侵略和心理屈辱的同时,开始思考现代化的问题,逐步确立了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而这一新的信念的确立,正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我们从鲁迅推崇赫胥黎《天演论》到信仰进化论,从苏曼殊钟情于拜伦、雪莱的浪漫主义,从梁启超大力介绍西方英雄传记等言论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受到西方著名人士的影响而终身不改其志的例子很多,胡适一生追随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徐志摩追随罗素、崇拜泰戈尔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巴金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信仰,梅光迪、吴宓、梁实秋们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宣传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都可以成为中西思想关系史上的佳话。还有,在五四时期西方著名学者来华的讲学,如杜威、罗素等人在中国的讲演,都像龙卷风似的激起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巨浪。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可是,仍然是好事多磨,就在第三辑丛书编完交付之际,出版社方面又出了状况。先是那位很有事业心的总编突然病倒,后来好像是出版社经营上发生了问题,拖了几年,书都已经排好了清样,做好了光盘,几经校对,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就是没有顺利出版。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当年支持这项工作的前辈巴金先生、元化先生都先后作古,李子云老师也卸下了文学基金会的工作重担。这期间我与其他人都做过努力,促使这套书尽快问世,但好像有其中的一本印出来了,其他九本依然杳无音信。在这种情况下,这套丛书的编者之一,同济大学的孙宜学教授慨然出面周旋,联系了江西高校出版社,并且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不愿看到这套有价值的丛书长期搁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不能焕发生命活力,也希望在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与学术发展中,继续能够听到上一世纪文学传统的薪火传承和大潮回响。经过几方面的协商,我们现在顺利将《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潮卷”交给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体例格式等一律沿袭原来的模式。在这里,我不

仅要向慷慨支持我们的江西高校出版社,也要向所有为这套丛书出版作过努力的朋友们,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

这套丛书与《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可以配套。《汇编》从整体出发,着眼于介绍大的思潮流派;这套丛书从具体人物着手,一人一本,深入而系统。两者搭配,正好是一个理想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库。前几年,我曾经在北大—复旦比较文学高级论坛上介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研究领域有没有参考资料和教材,我的回答是,教材目前有过几种,但真正的有参考价值并可供阅读研究的原始资料,却很少。现在《汇编》与这套《世纪的回响》相继出版,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世纪的回响》原来就有钱谷融先生写的序在上,但因为换了新的出版社,有些事情需要向编者、读者和朋友们有所交代,于是再作如上的补充,是为序。

2009年2月9日写于香港岭南校园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90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90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90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90年中,我们却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趣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吗?

新中国成立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1935年12月到1949年4月止,历时14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七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惟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而话又说得很谦虚。

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地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对将近90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编辑加以出版。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曾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一些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实用主义之我见——杜威在中国》序

刘放桐

张宝贵先生编辑完成了《杜威在中国》一书,其中收录了现代中国学者对杜威的介绍、研究、评论等方面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论著以及五四时期杜威访华时的部分讲演记录稿。他表示希望我能为之作序。我过去虽然研究过杜威,对中国学者的有关杜威的论著也大都接触过。但我在这方面的素养早已落后于近年来崛起的年轻学者,对张宝贵先生编选本书具体情况又知之不详,由我来作序也许并不适当。其所以还是应承下来,是因为我觉得杜威在现代西方思想家中很有代表性,他的理论倾向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西方思想界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因此只有从西方哲学在现代的变更的大背景下,才能对杜威的理论有如实的理解,而对杜威的这种理解反过来又可促进我们对整个现代西方思潮的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倒有些想法,愿意在此说几句话。

杜威是继皮尔士、詹姆士之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在每一领域都有创见。就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说,他显然超过了他的这两位前辈。他在这些领域的理论都曾为中国学者所研究和介绍,也都发生过较大影响。由于他的思想在其前后后期有一个发展过程,存在着某些不确定和不一致之处,加上涉及的领域又很广,这使抱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用不同尺度对之作出评价。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对杜威的评价是大相殊异的,而这些评价往往都能援引杜威的某些言论来作证。因此我认为,为了较为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杜威,就必须超越杜威的理论的某些具体的、特别是他在某些场合下的片断之言,而在西方思潮在现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更的大背景下,从整体上把握他的理论的基本倾向。

谈到西方思潮在现代的变更,首先当然必须注意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在这方面,近年来我国哲学界有过不少讨论。尽管迄今各家具体说法仍有不同,但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作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在此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践的观点,看不到人的能动性;唯心主义由于脱离客观现实,只是抽象地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同样没有真正的实践观点。他接着强调了实践的观点在哲学研究中的决定性意义,认为“人的思维是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

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在实现其哲学变更时无疑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这以他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为出发点,其主要目的不是建立以探究万物本原为基础的无所不包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实践超越一切僵固和封闭的体系,回到现实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

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同时,西方哲学也在进行着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这一转型是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人创始的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及以孔德和穆勒等人创始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的。这两种思潮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织。它们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有的人甚至以某种较为含混和不彻底的形式提出哲学应当以人的生活和实践为基础,主张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企图以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来取代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这种转换与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更当然有原则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毕竟存在共同之处。

杜威的哲学及相关的其他理论不仅是在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而且是体现这种转型的一种相当典型的形态。它兼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特征。因此我们只能按照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而不能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对之作出理解和评价,否则就会离开它的实际所是。五四以来我国学术界在理解和评价杜威思想上出现过诸多失实,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离开了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或者说未能摆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眼界,显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在此无法涉及杜威思想的广阔领域,仅简单提一下他的经验论。

经验概念无疑是杜威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他前后期的表述虽有差别,但基本含义大体一致,都认为经验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传统意义下的知识。杜威认为近代哲学对经验的解释的主要缺点是把经验当作主体对于与其分离的对象的一种认识。这就把经验当作不同于自然界的精神存在,把经验和自然、精神和物质分割开,归属于两个不同领域,陷入了“二元论”。近代唯物主义把自在的自然界当作出发点,而近代唯心主义则把观念(经验、精神)世界当作出发点,都同样把主客心物等分离开来而追究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本质、基础。杜威力图超越这种倾向。他不把经验当作独立的精神(意识)存在,而当作主体(生活和行动着的人)和对象(自然和社会等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的“贯通作用”,表现为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在杜威哲学中,经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发生于活动过程中的功能性存在。与此相应,作为主体的人是与社会和他人具有广泛联系,并不断地与环境发生关系,即对

环境进行改造的人,而不是孤立的和单个的人;作为客体的世界是人的经验中的世界,即经过人的改造(人化)的世界,而不是世界本身。他对后者自在地存在并不否定,只是认为它一旦成为人的生活 and 经验的对象,就必然为人的生活 and 经验所制约,也就是被人化,失去了其自在性。杜威的这种经验观,也就是他的生活观、行为观、实践观。他一再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就是人与其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行为、实践。他的全部哲学正是以这样的经验、生活、行为、实践为出发点的。

要求哲学超越对自在的物质或精神世界的追究,回到现实的人及其所生活(牵涉)的世界,回到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正是现代哲学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全面、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特点。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例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各以某种含混、片面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特点。杜威在这一点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他远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揭示人的生活 and 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的经验论还存在其他许多片面性,但他毕竟明确地要求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根本观点,从而从整体上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他关于真理、方法、道德、教育、美学以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理论,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特点。

从追问关于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划分唯物唯心当作哲学研究的根本内容、并把是否坚持唯物主义当作评价标准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观点看,对杜威以及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只能作出否定的评价。因为他们不仅明确无饰地反对各种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而且还要求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标准意义下的主客、心物、思存关系问题。如果把从作为主体的人出发来看待世界并认为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为人体本身所建立和规定(人化)的学说当作“唯心主义”,那他们的哲学的确都可归属于唯心主义。杜威等人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自己的哲学为“唯心主义”。我国哲学界以往对杜威的那些用词激烈的批判往往正是由此出发的。

然而,如果我们能遵循马克思本人所明确阐释过的哲学立场、而不是遵循马克思所一再要求超越的近代哲学立场,那我们就应当超越上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眼光,而用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眼光来重新研究和认识杜威及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如果我们坚持近代哲学思维方式,那我们不仅会简单地否定杜威之类现代西方哲学家,也会否定马克思本人所阐述的哲学立场。如果我们能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眼光,那我们就会发觉以往对杜威及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存在很大的误解,所作的批判许多并不符合实际,从而应当努力克服这些误解,对之作出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评价。

这当然不是要对以往的研究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其中的许多合理和积极的因素,我们仍然应当肯定。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研究和批判都受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谁也难以摆脱这种限制,我们不能因前人未能摆脱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而去苛责前人。历史是一面镜子,认识和研究这种历史制

约性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重新研究杜威时,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研究杜威本人的著作,而且要用这样的观点来总结前人的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张宝贵先生的《杜威在中国》一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不仅相当丰富的关于“杜威在中国”的历史文献,而且编辑很是全面、系统,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另外,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后记,不仅很有文采,所作的分析和评价也很得体,感到很受启发,特向读者们推荐。

目 录

- 1/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陈思和
- 5/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 7/ 《实用主义之我见——杜威在中国》序 刘放桐

肖像篇：心影游踪系华夏

——现代中国对杜威的介绍与评述

- 3/ 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
- 4/ 记杜威博士
- 5/ 为欢迎杜威博士致江苏省教育会函
- 6/ 美国杜威博士到沪
- 7/ 省教育会连日大讲演
- 8/ 胡适之博士讲演记略
- 9/ 杜威博士赴杭讲演
- 10/ 杜威先生略传
- 11/ 约翰杜威博士教育事业记 周由庠
- 14/ 杜威博士讲演哲学记
- 17/ 杜威博士离粤回京
- 18/ 杜威博士在京末次讲演通告
- 19/ 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适
- 21/ 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

- 25/《明日之学校》译者序言 朱经农
27/ 克伯屈教授与杜威博士 公
28/《哲学之改造》序 胡汉民
34/《道德学》译序 余家菊
35/《经验与教育》译者序 李培圉
36/《道德与辩证法》译者序 李书勋
40/《民本主义与教育》译者序言 邹恩泽(邹韬奋)

译作篇:疾笔苦求信达雅

——现代中国对杜威著作的翻译

- 45/ 逻辑的改造之意义 杜威著 唐擘黄(唐钺)译
54/《道德学》作者原序 杜威著 黄陂 余家菊译
56/《民本主义与教育》作者原序 杜威著 邹恩泽译

研究篇:忽兮恍兮他山石

——现代中国对杜威思想的研究

- 59/ 杜威之伦理学 蒋梦麟
68/ 杜威之论理学 刘经庶(刘伯明)
71/ 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 胡适
74/ 杜威的教育哲学 胡适
81/ 实验主义
——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辞 胡适(潘公展笔记)
85/ 杜威博士的《学校与社会》 志希(罗家伦)

- 89/ 杜威博士的《德育原理》 志希
92/ 哲学的改造 愈之(胡愈之)
94/ 杜威论中国思想 刘伯明
97/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瞿秋白
101/ 知识果是工具么 张水淇
104/ 驳实验主义 朱言均
108/ 实验主义者的理想 均量(刘均量)

应用篇:妙手拈来攻玉法

——杜威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

- 111/ 实验主义与新教育 陶知行
114/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117/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121/ 新教育
——陶知行在浙江第一师校毕业生讲习会讲演 李宗武 洪璆笔记
127/ 《科学与人生观》序 胡适
137/ 新教育是什么 陈独秀
143/ 谈理想教育 林玉堂(林语堂)

演讲篇:舌簧鼓动非拈花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

- 151/ 平民主义的教育
——记杜威博士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词的大要 潘公展笔述

156/ 学问的新问题 杜威演讲 胡适翻译(志希 毋忘合记)

161/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高一涵记

165/ 大学与舆论

——北大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杜威教授的讲演 高尚德(高君宇)

168/ 思想的派别·实验派(节选) 吴康(吴致觉) 罗家伦记

179/ 伦理演讲记略(节选)

185/ 教育与实业

——杜威在福州青年会讲演

188/ 南游心影

——杜威博士讲演 淑兰(冯沅君)笔记

192/ 自动的研究

——杜威在福州青年会讲演

194/ 习惯与思想

——杜威在福州青年会讲演

196/ 教育哲学

——杜威博士在教育部第二次演讲 君宇(高君宇)笔记

200/ 附录一:主要外国人名、概念译法对照表

202/ 附录二:杜威传(节选)

204/ 附录三:杜威信札:杜威发自上海的家书 张午译

206/ 附录四:杜威对中国问题的评论:中国的生活哲学(节译) 杜威著 张午译

209/ 附录五:《杜威在中国》参考文献(部分)

213/ 附录六:杜威在中国年表(1919年2月—1921年12月)

222/ 后记:拂开尘迹话情缘 张宝贵